

顾问 杨麟 苏智良 毛剑锋 蔡亮 江文君 周小燕 张婷婷 肖阿伍 编著

中国抗战内迁 实录



辗转大半个中国，寻访百余位亲历者
真实记录抗战内迁恢弘历程

颠沛流离的生活 悲欢离合的故事
可歌可泣的事迹 英勇不屈的抗争

顾问 杨麟 苏智良 毛剑锋 蔡亮 江文君 周小燕 张婷婷 肖阿伍 编著

中国抗战内迁 实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抗战内迁实录/苏智良等编著. —2 版. —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 - 7 - 208 - 13165 - 1

I. ①中… II. ①苏…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7779 号

特约编辑 陈敬山

责任编辑 孙瑜

封面设计 范昊如

中国抗战内迁实录

苏智良 等 编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6 插页 2 字数 417,000

2015 年 8 月第 2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3165 - 1/K · 2401

定价 78.00 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课题

上海市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研究课题

上海市教委中国史高原学科研究课题

本书出版得到上海文化发展基金资助

民族史诗 历史丰碑

苏智良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
去大后方。
历尽了，
渺渺长程，
漠漠平林，
垒垒高山，
滚滚大江。
似这般寒云惨雾和愁苦，
诉不尽国破家亡带怨长。
雄城壮，
看江山无恙，
谁识我一瓢一笠走他乡。

这首明末清初戏曲家李玉的名篇《千钟禄》，唱出了那些末代君王的千古伤心。2004年，南怀瑾先生略作修改，成为纪录片《去大后方》的主题曲。笔者斗胆将“渺渺途程”改为“渺渺长程”，以与“漠漠平林”对应。

公元1931年至1945年。

“九一八”、“七七”、“八一三”，日本军国主义的魔爪踏向了亚洲大陆。

在千年一劫的危难时刻，中华民族6000万儿女，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工商老板、小工苦力，他们挈妇带女，扶老携幼，从海边走向大山，从莽莽林海前往黄土高原，从富饶的江南奔赴偏远的西南。他们不分老幼，不分男女，不分信仰，不分党派；为了生存，为了延续民族的血脉，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走上艰苦卓绝的迁移之路。崎岖的公路，绵延的小道，浩浩的大江，逶迤的河流，到处是转移的人流，到处是背井离乡的人们，他们只有一

个心愿：向西，向西，再向西！

抗战大迁徙，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过如此规模的战略大转移？世界上有什么民族遭受过这等的苦难！

去大后方，也是转投前方，因为中华民族的抗战，是全方位的。去后方，奔前方，其意义和精神是一致的。从延河之水，到滇池之畔，大后方汇聚起千百万中华不屈的子孙。“衣”的简朴，“食”的匮乏，“住”的简陋，“行”的艰难，“活”的困苦，他们以坚韧的意志默默地承受着战争的重负，却谱写出一幕幕气壮山河的时代剧，创造出一个个人间奇迹：西南联大、内迁工厂、滇缅公路……“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本书记录的就是这些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中华的芸芸众生，他们颠沛流离的生活，悲欢离合的故事，可歌可泣的事迹，英勇不屈的抗争；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不屈不挠民族精神的化身。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一部血泪抗日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化的颂歌。

抗日战争已过去 70 年了，随着时间的洗炼，大部分亲历者已经离去，而今剩下的抗战时期的遗民，也都达八九十岁的暮境，许多悲壮的事迹已无人知晓，许多感人的故事已湮没不传。为了保存历史，在 2003—2004 年，从上海到重庆，从亚洲大陆到北美，我们《去大后方》摄制组和编写组采访了一百多位遗民故老。其中有李政道、杨振宁、任继愈、唐德刚、南怀瑾、何康、赵耀东、杨麟、牛惠临、宗之琥、卢国纪、徐明庭、王诗铮、刘白羽、宗璞、沈克琦、赵寻、杨宪益、施雅风、陈鸿逵、竺宁、凌琯如、杨玉藩、梁从诫、舒乙、秦怡、于蓝、孟波、李文铸……他们大多已白发苍苍，甚至老态龙钟，可是热心国家的发展、关注民族的命运之心是相通的，我们与这些值得敬仰的前辈们同欢笑、同悲泣、同欢乐、同忧虑、同高歌、同祝福。如今，十年匆匆而过，任继愈、唐德刚、南怀瑾、赵耀东、刘白羽、赵寻、杨宪益、施雅风、陈鸿逵、凌琯如、梁从诫、李文铸等前辈已相继作古，令人感慨万千。

我们本着明史知耻、明史知理、明史知责的自觉，用良知、情感和智慧投入这项激动人心的工作。现在，谨以本书献给伟大而悲壮的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献给投身于那个伟大年代，为卫国战争流过血、出过汗的前辈们，

也献给我们民族的后来者。给现在和未来的人们提供一个接近历史、认识历史和反省战争、珍视和平的机会。在新世纪之初回顾历史，在新的时空坐标中再回首抗战，具有非同寻常的警世意义。

我们希望这份属于全球华人的光荣与卓绝，能作为一份时代真品，而传诸永远。

2005年1月初版

2015年2月修订

目 录

民族史诗 历史丰碑 苏智良 1

第一章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1

第一节 迁都“大彩排” 2

迁都纷争 冠盖云集洛阳 东返南京

第二节 “衣冠西渡” 8

硝烟弥漫中的迁都决定 挥泪别都 稳定民心

踏上迁都征程 规划官衙

第三节 抗战时期的重庆 14

强龙与地头蛇之争 经营重庆 好评如潮 法定

陪都 剧变中的重庆

第四节 重庆大轰炸 22

哭泣的重庆 悲壮的重庆 惨烈的重庆 轰炸反

思 不屈的重庆

第二章 民族工业大迁移 45

第一节 抗战时期的工厂内迁 46

决议内迁 途中艰辛 各省内迁 再迁四川

蜀道艰难 内迁余波

第二节 大鑫厂与大中华的内迁 65

上海工厂内迁之概况 大鑫厂之内迁经过 抗战中
的大中华橡胶厂

第三节 “天”字号系统的积极内迁 74

国难当头 积极内迁 人祸不断 困难重重 进退
维谷 再迁四川 积极重建 恢复生产

第四节 刘鸿生企业的内迁经过 85

处事的哲学 避祸走香港 途中的艰难 官资的侵吞

第五节 抗战中的“永久黄” 92

永利碱厂的内迁 永利硫酸铔厂的内迁 大后方的业绩和遭遇

第六节 荣氏企业在抗战中的命运 101

荣宗敬逝世香港 炮火下的荣氏企业 内迁中的荣氏企业 重建中的荣氏企业 租界里的荣氏企业

第三章 抗战时期的交通 113

第一节 抗战烽火中的虞洽卿 114

江阴沉船的义举 “三北”的内迁过程 “孤岛”时期积极救助难民 竭力维持“孤岛”秩序 处境艰难走香港 大后方的经济活动 支援家乡教育

第二节 抗战中的卢作孚与民生公司 125

“人的建设”的思想 抗战初期的忙碌 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几何计划”解决粮食问题 “三薪制”和“民俗”轮的悲剧

第三节 滇缅公路——战时的生命线 140

鸡毛信的故事 筑路中的艰辛 招募南洋机工 南洋归来的“花木兰” 炸桥与修桥 战争背后的辛酸故事 “远征军”魂断野人山 惠通桥争夺战

第四节 长空飞虎与驼峰航线 157

中国空军的窘境 危难中筹建“飞虎队” 长空飞虎显神威 令人伤感的结局 飞越生死的“驼峰航线” “死亡航线”中的惊险一刻 “死亡航线”中的中美友谊

第四章 高校内迁 173

第一节 西南联大 175

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 读书救国的联大师生 刚毅坚卓的联大精神

第二节 淹大四迁 191

初迁浙江建德 继迁江西吉安与泰和 再迁广西宜山 终迁贵州遵义、永兴

第三节 华西坝五校 209

联合办学 共赴国难 大师云集 一时之盛

第四节 其他内迁高校 216

中央大学 同济大学 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圣约翰大学

第五章 苦难的民众 229**第一节 难民救济 230**

难民政策 救难机构的设置 真实的事例：上海南市难民区 拉贝与南京安全区

第二节 在路上 251

难民基本情况 在路上——苦难的历程 难民的回忆——叠加的多重暴力

第三节 内迁的难民 270

危急存亡之秋的内迁难民 内迁难民的生活和救济
浪迹滇黔桂

第六章 文化大迁移 287**第一节 “戏剧轻骑”遍神州 288**

救亡演剧队的建立 孩子剧团 抗敌演剧队的成立
《放下你的鞭子》 长途跋涉 与群众心贴心 西南剧展

第二节 在昙花林和长沙的日子 304

昙花林中三厅的成立 三厅开展的救亡活动 救济金的发放

第三节 爱国电影和音乐事业 312

抗战时期的电影 颠沛流离而弦歌不辍

第四节 香港生死劫 319

中国抗战内迁实录

香港秘密大营救 夏衍海上遇险 科学家高士其脱险记 胡蝶白首话当年 克尔中尉虎口脱险

第五节 国宝劫难备忘录 326

故宫文物历险记 南路文物的抢运 北路文物的抢运 中路文物的抢运 “北京人”头盖骨秘密失踪 头骨化石是否遭日军劫掠 千方百计寻找“北京人”

第六节 文人国难曲 336

齐白石“开尽秋风不折腰” 蒋兆和妙手绘丹青 刘湛恩为国捐躯 朱生豪呕心沥血译莎剧 合众图书馆 郑振铎的“最后一课”

第七章 大后方生活素描 343

第一节 苦重庆 344

“衣”的简朴 “食”的匮乏 “住”的简陋 “行”的艰难 “活”的困苦 苦中作乐

第二节 警报声、防空洞中的重庆民众生活 360

躲警报 在防空洞中 残忍的大轰炸 重庆人民的反空袭斗争

第三节 文人生活众生相 369

每况愈下的生活 张恨水在“待漏斋” 老舍戒烟和借衣 碧野的内疚 “教授教授 越教越瘦” 教授夫人卖麻花 战乱中的悲欢离合 患难见真情 记忆中的李庄

第四节 青年跪求商人 将军挥泪作诗 387

后方各地的献金抗战运动 我们都跪下了 妇女的献金运动

尾 声 395

主要参考书目 397

后 记 403

再版后记 404

第一章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虽进行了抵抗，但仍节节失败。战略大撤退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成为国民政府摆脱险境的首选。蒋介石等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权衡和筹划，最后于1937年11月将首都迁往重庆，山城重庆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成为抵御日军的后方总基地。这是国民政府继1932年迁都洛阳后的又一次大迁移。日军为达到摧毁中华民族抗战意志的目的，对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轰炸，给重庆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英勇的中国人民群众志成城，守望相助，顽强地投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

第一节 迁都“大彩排”

南京国民政府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迁都的“壮举”。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迁都重庆，历时八年之久，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在这之前，1932年国民政府曾一度迁都洛阳，并把洛阳定为“行都”，只有短暂的10个月时间，这一史实往往鲜为人知，已逐渐地淹没于历史长河中。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梳理，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这次迁都，从其发生的背景、经过等来看，与后来的迁都重庆颇有相似之处，但政治、军事中枢没有真正转移，因而，一般称其为一场迁都的“大彩排”。

迁都纷争 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同时在南京的下关江面上集结了大批军舰，这对南京国民政府构成了直接威胁。于是，国民政府就计划将首都迁往洛阳。但此事在国民政府内部一石激起千层浪。为了统一思想，南京国民政府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议的焦点聚集在了政府迁移问题，争论激烈，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不表

态者有之。刚辞职不久的前外交部长陈友仁，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爱国将领冯玉祥等人坚决主张抗战，反对迁都。然而，握有实权的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却一致认为，日强中弱，中国不能马上抗战，只能迁都。最终，在蒋介石等人的极力主张下，通过了迁都的决议。当讨论往何处迁都时，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去西安，那里曾经是数朝古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人主张到汉口，那里地处长江中游，交通便利；甚至有人建议回广州。蒋介石摇头晃脑地说：“洛阳好，洛阳北有黄河，南有伊阙，东西有伊水、洛水，东有黑石关，西有张毛硖石的险要。”冯玉祥心里骂：“兔崽子们，抗日不积极，逃命倒迅速。”他冷冷对众人说：“洛阳在古时火器不发达时，凭险可守，今天飞机、大炮为主的现代战争，已没什么凭险可守的价值。”一木难支危楼。当下会议决定国民政府迁都洛阳。^①

就当时形势而言，选择洛阳作为行都还是比较可行的。其时，日军刚刚占领东北三省，对北平虎视眈眈，所以迁往北平不合时宜；位于黄河流域关中平原的西安，当时交通不太方便，所以，西安作为国民政府所在地也不理想；而“一二八”事变前后，武汉已经处于日军的直接军事威胁之下，因而迁往武汉也不合适；虽然重庆适合作为战时国都，但当时云、贵、川地区军阀割据，各自为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还未深入其中，所以无法往重庆迁。经过权衡利弊，国民政府最后将目光投向了洛阳。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横跨黄河中游两岸，东临嵩岳，西接三门峡要隘，北靠太行屏障，并有黄河之险，南与平顶山相连。黄河、伊河、洛河、涧河等十余条河流蜿蜒其间，地势险要，交通便利，素有“九州腹地”、“十省通衢”、“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之称。所以，历史上，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过都，历时一千多年。到了近代，吴佩孚、冯玉祥等人统治洛阳时，曾不断开发建设，市容市貌有较大变化，还贯通了陇海线铁路，大体满足了国民政府暂时迁都的需要。

事后，宋子文认为：“国民政府移驻中国历史上名都洛阳办公，系逻辑上必然之步骤。在日本炮舰暴力威胁之下，任何政府必不能正当行使其职权。”^②蒋介石在1932年1月29日日记中也称：“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

^① 以上对话见王磊等著：《1937—1938南京政府大撤退》，第60页，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引自刘敬坤、富兵：《民国时期的首都、陪都与行都》，《民国档案》1994年第1期。

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获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一人获罪之可比。”^①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等联合签署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宣称：

日本所以继续使用此等暴力政策，且进而愈厉，其用心不过欲威胁我政府，使屈服于丧权辱国条件之下。政府受国民付托之重，惟知保持国家人格，尊重国际信义，决非威武所能屈，惟有坚持原定方针，一面督励军警，从事自卫，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一面仍运用外交方法，要求各国履行其条约上之责任。……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②

蒋介石等坚持迁都之事迅速传开，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为了争取舆论支持，蒋介石通电全国：

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进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即起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心之暴日相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③

冠盖云集洛阳 从1月30日起，国民党中央各机关和国民政府陆续往洛阳迁移。为及时、方便处理政务，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在南京亦设有办事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率国民党军政要员1000多人乘专车“逃难”洛阳，仅留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等继续在南京处理善后事宜，负责维持治安和对日交涉，京中所有事务由何应钦负责。30日，何应钦发表谈话称：

现外侮日亟，政府为捍卫国土，保障主权，免除威胁，完全自由行使职权起见，暂移洛办公，以后首都治安，除由京沪卫戍司令官宪兵司令及首都警备司令等积极维持外，并经政府命令本部长负责处理，地

① 引自蒋顺兴、孙宅巍主编：《民国大迁都》，第162—16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引自蒋顺兴、孙宅巍主编：《民国大迁都》，第16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 王磊等著：《1937—1938南京政府大撤退》，第61页，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

方治安，决无他虞。^①

事实上，蒋介石自己没有前往洛阳，却来到位于南京北大门的浦镇。林森率领参军长吕超等人由铁路经过陇海线到达洛阳，同往的国府随从人员比较少。因而，洛阳各职能机关无“公”可办，也没有人具体负责，基本上是个空架子，国民政府的公报、政令以及公文等仍在南京办理，首都南京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政治中心仍在南京。林森虽是国民党元老，但不久前刚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迁驻洛阳只是行都的象征。军政部长何应钦听命于蒋介石，因此，政治决策、军事部署等都牢牢控制在蒋介石手中。

2月初，国民党中央大员们陆陆续续抵达洛阳，一时政要荟萃，冠盖如云。那几天，津浦线、陇海线上的铁路运输非常繁忙，常常可以看到中央政府高官们的身影，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转移中，许多机关连桌椅等办公用具也全部搬迁到洛阳。但糟糕的是，洛阳那几天雨雪交加，这为政府迁移带来了颇多麻烦。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迁到洛阳后，驻扎在当时洛阳城关各处：国民党中央党部驻西工原吴佩孚巡阅使署（今西区政府一带）；国民政府驻城内原府尹衙门（今老城青年宫），门上“国民政府”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格外引人注目；蒋介石和迁洛后成立的军事委员会驻第四师范学校（今洛阳一中西院）；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住在西工公馆街天字第一号房（今市政府家属院），这里是吴佩孚公馆旧址；汪精卫和行政院驻河洛图书馆（今图书馆街老城房管所）；监察院驻南关贴廓巷庄姓民房；司法院驻城内地方法院（原张敬尧公馆，今老城和平巷）；考试院驻西关周公庙；其他各机关分驻西工兵营。

洛阳虽然是历史文化名城，享有“九朝古都”的美誉，美丽繁华，但那已经是非常遥远的历史。国民政府的中央大员们风尘仆仆地赶到洛阳，对洛阳的市容唏嘘不已，大失所望。沧海桑田，昔日的辉煌景象，殿阁楼宇，都荡然无存。灾祸频仍，战火纷飞，眼下的洛阳满目疮痍，美丽的“公主”变成衣衫褴褛的“乞丐婆”了。政府机关刚到洛阳时，遇到不少棘手的问题。洛阳当时电灯设备不足，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各机关都用当地制造的小红纱灯来燃烛照明，微风拂过，烛影飘动，倒别有一番情致；同时，由于办公所用地毯就地无从购置，只好用红毡代替。因此，当时洛阳各商铺的纱灯、红

^① 引自蒋顺兴、孙宅巍主编：《民国大迁都》，第16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毡，很快售罄。至于交通工具，由于各机关来时仓促，汽车多数没带来。为解决这个困难，洛阳地方政府将全市人力车按区编组，作为党政大员们的“专车”，一概由政府按天支付车费。最大的困难是房屋缺乏，有限的房屋难以迎合蜂拥而至的政府各院部会的需求。经过多方努力，各机关好不容易有了歇脚的地方，但都驻扎在较大的学校、庙宇等处所。这样的条件，对于平日养尊处优的中央大员们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据冯玉祥回忆：“那些自称革命的新贵们，来到洛阳，一看即垂头丧气了，没有洋楼，没有地板，没有新式马桶，更没有大餐可吃，所以很多的人都表示不满意了。”^①无奈处此非常时期，只好降格以求其次，至少他们在这里可以躲开日军枪炮的直接打击。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后，曾召开两次重要会议——1932年3月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和4月的“国难会议”。在四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国民党元老张继等人提出的《确定行都与陪都地点案》。决定：一、以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②如果说以前国民政府为了逃避日军的进攻威胁而迁往洛阳办公是权宜之计，那么这次会议的召开，给洛阳冠以“行都”的称号，则具有长久之意。四届二中全会闭幕后，4月7日至12日国民政府又召开了“国难会议”，这是一次由政府和民间人士共商国是的会议。会议最后通过了《国难会议宣言》。但收效甚微，并未实现挽救“国难”的初衷。

东返南京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之日，正是蒋介石、汪精卫重新上台之时，当时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再度合作的局面。汪精卫负责外交工作，他主张对日本妥协，淞沪抗战期间曾公开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八字方针。在这一方针的影响下，中日双方于1932年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国民政府以国家利益为代价换取了日军对南京军事威胁的暂时解除，首都南京“安全”了。而此时的南京虽然只留有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驻京办事处的招牌，但实际上为方便、及时地处理政务，一切外交、军事以及法律议案之审理等事务均就近在南京办理，可谓“迁洛其名，留京其实”。事实上，国民政府法定首都仍然是南京，如果长期在洛阳开会、办公会招致非议，有损其威信。于是，还都成为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重要议

^① 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3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引自蒋顺兴、孙宅巍主编：《民国大迁都》，第18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